

家庭资本、校外培训与教育机会公平

■张和平 张青根 尹霞

摘要:中小学阶段的家庭资本与校外培训的关系暗含着教育机会公平与社会地位获得及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社会学论题。基于全国性的中小学校外培训调查数据,采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班的数量以及校外培训支出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当把校外培训视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有益教育资源时,家庭资本对校外培训资源获得的决定性影响将导致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政府对中小学校外培训的政策应围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需求问题进行顶层设计。

关键词:家庭资本;校外培训;影子教育;教育公平;机会公平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质量与创新导向下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影响机制与激励策略研究”(编号:DIA200341);湖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2020年课题项目“‘青椒’学术职业发展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湖北省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研究”(编号:jsjy202003)。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1)2-0003-09

作者简介:张和平,男,博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张青根,男,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尹霞,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生发展协同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205)。

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1.02.001

教育一直被视为促进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古今中外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从未减弱过。广义的教育既包含正规三级学校教育,又包含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非学校教育^[1],中小学阶段的校外培训属于正规三级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在大众心目中,无论是正规学校教育还是校外培训,都属于教育。人们相信教育投资一定能产生未来价值和长远回报,因此校外培训被家长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而加以追逐,这种趋势因“全民教育运动、教育全球化、科技助推教育、普遍强调学业成果,以及国家、学校、社会阶层和个人等多个层面日趋激烈的教育竞争”而不断加强,中小学校外培训迎来前所未有的扩张,从过去东亚各国所独有发展成世界各国所共有^[2]。

校外培训一旦被家长视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学生是否有能力获得校外培训以及获得校外培训的多寡好坏,将直接影响教育机会公平。非学校教育对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的显著影响已得到较多实证研究支持^[3-5],也有研究表明校外培训对学生成绩产生积极正向影响^[6],这意味着校外培训还可能影响到教育结果公平。对教育公平的讨论,似乎到了不得不扩大其观察范围的时候。

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一直被讨论,但过去的研究较多关注了家庭背景对正规学校教育公平的影响^[7-9],较少关注家庭背景与非学校教育中公平问题的关系。本研究将校外培训视为一种非学校教育资源,借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将家庭资本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来衡

量,以中小学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托宾(Tobit)回归模型分析家庭资本与学生校外培训(学术类和素质特长类)参与、校外培训支出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家庭资本与校外培训之间的关联可能对教育机会公平带来的潜在影响。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资本、教育机会与社会地位获得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场域作为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社会由大大小小的场域构成^[10]。他将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行为(如文化活动)也视为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在场域分析中引入资本的概念,场域内存在竞争,决定竞争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社会人在不同场域追逐着不同的符号资本,资本既是场域中竞争行为的目标,又是竞争的手段。

布迪厄将资本分为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但他的资本概念不同于经济学,而是在隐喻意义上用这一概念来描述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布迪厄认为社会中的场域不同于赌场,赌场是完全竞争的,赌徒面对同样输赢概率,机会是平等的。而社会活动的参与者存在很大异质性,他们一开始就拥有不同的资本,这些资本具有历史积累性和排他性,在场域中分配不均。这些资本又是新一轮社会活动的起点,资本拥有的差异决定了起点不同、机会不同和竞争的不平等^[11]。

布迪厄认为社会结构存在复原自身的机制,家庭成员通过再生产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社会化的结果,通过社会化,不同家庭背景的子辈继承父辈的文化资本,实现社会成员的差异化代际传递。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一种以教育为媒介的间接再生产,在特权、优势资源和权利的代际传递中,没有一种方式比教育看起来更公正与合法,教育以貌似中立的角色在阶层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

尽管布迪厄将资本分为三个维度,但他认为社会资本既不独立于,也不包含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是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无休止的社会交往”中进行转换而被创造和维持。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继承并发展了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从理性行动理论的视角提出社会资本是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他从理论上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并在对青少年和学校教育的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不仅对教育获得存在积极影响,而且是理解教育机会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纽带^[13]。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理论观点。

在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中,马克思(Karl Marx)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人的社会阶级关系)。韦伯(Max Weber)提出“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多元化标准来划分阶层,经济要素是首要的,他还认为社会分层中存在“通过财产和教育而获得特权”的问题。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社会分层归结于社会分工和职业等级的存在,分工和等级的差异也体现为经济利益上的差异。涂尔干认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差异上,因个人才智差异造成的内在不平等是必要的,需要解决的社会不平等主要是外在不平等,即由家庭出身和家庭资本不同导致的不平等^[14]。可见,经典社会分层理论把经济资本视为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

在家庭资本如何塑造社会地位的研究中,布劳和邓肯(Peter M. Blau & O. D. Duncan)提出了地位获得模型,塞维尔(William H. Sewell)等人对布劳和邓肯的模型进行修正提出了威斯康辛模型^[15],这些模型都将教育视为重要的中介变量。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模型,家庭资本不仅对正规学校教育机会获得存在显著正向影响^[16],而且对校外培训参与(或影子教育)也有显著正向作用^[17-20],而受教育机会是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决定性因素^{[21][22]}。这些理论模型和经验证据都表明受教育机会在家庭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及阶层再生产之间具有重要作用。

很多证据表明,较高的社会阶层地位为家长提供了可供利用的资源,促使他们的孩子在学习中更优秀。但当家庭拥有这些资源时,孩子并不会自动获得好的结果,家长必须“投资”或者说“激活”这些资源才能获得社会收益,必须建立社会结构和个人

生活经历之间的关联性。例如很多重要的社会阶层文化可以成为文化资本,家长通过激活这些文化资源努力让孩子适应教育组织的评价标准^[23]。因此越是有资源优势的家长,越有可能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规划和教育决策中去^[24]。家庭通常会基于一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子女进行尽可能多的教育规划和投资(包括学校教育和非学校教育),以帮助下一代获得社会地位优势和社会阶层向上流动。

(二)教育供给、家庭资本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拉弗特里和霍特(Adrian E. Raftery & Michael Hout)提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MMI),认为扩大教育供给不一定能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只要上层阶级或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还有可能获得更多教育机会,他们就一定会抓住这些教育机会,他们有资源、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此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只有当某一层次的教育供给达到饱和(比如说80%以上的中上层阶级子女都能获得该层次的教育),这一层次的教育不平等才会真正缩小甚至消失^[25]。MMI理论假设得到了国外多国比较实证研究以及中国本土实证研究的支持^{[26][27]}。

但是,卢卡斯(Samuel R. Lucas)认为MMI理论忽略了教育供给的质量维度,教育供给事实上包含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卢卡斯对MMI理论进行修正,提出“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简称EMI),EMI理论认为即便某一层次的教育供给在数量上达到饱和,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是会存在,因为上层阶级或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会争取更高“质量”的教育。换句话说,即便数量上的教育平等实现了,质量上的教育不平等仍会维持下去^[28]。EMI理论假设也得到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结合EMI理论和对我国社会的观察,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家庭将借助自身资本追求更多(数量上的)和更好(质量上的)的教育机会,从而长期维持教育机会获得上的优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家庭文化资本对校外培训有显著正向影响。

子假设1a:家庭文化资本越高,父母对子女校外培训投入越多。

子假设1b: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子女参与学科及竞赛类校外培训越多。

子假设1c:家庭文化资本越高,子女参与素质特长类校外培训越多。

假设2:家庭社会资本对校外培训有显著正向影响。

子假设2a:家庭社会资本越高,父母对子女校外培训投入越多。

子假设2b: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子女参与学科及竞赛类校外培训越多。

子假设2c:家庭社会资本越高,子女参与素质特长类校外培训越多。

假设3:家庭经济资本对校外培训有显著正向影响。

子假设3a:家庭经济资本越高,父母对子女校外培训投入越多。

子假设3b:家庭经济资本越高,子女参与学科及竞赛类校外培训越多。

子假设3c:家庭经济资本越高,子女参与素质特长类校外培训越多。

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一)研究变量

1. 校外培训。校外培训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本研究将校外培训的定义从马克·贝磊(Mark Bray)提出的“补充性、私有性、学术性”扩展为“补充性、私有性、学术性、素质性”^[29],将校外培训分为学术类(学科及竞赛培训)和非学术类(素质特长培训)。同时从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班的“数量”及其“支出”两方面来测量校外培训。家长调查问卷就学科课程培训(如语文、数学、英语、生物、物理、化学等)、竞赛培训(如奥数、作文等)、素质特长培训(如珠心算、记忆、琴棋书画、体育等)分别询问了家长“过去一年里孩子参加各类校外培训班的数量”及“过去一年在孩子校外培训上的总支出”。本研究对学科课程培训班和竞赛培训班的数量进行加总,对培训支出的分类选项取中值处理,最后得到

“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培训支出”三个因变量,均作为连续变量。

2. 家庭资本。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家庭资本”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来衡量。(1)文化资本包括“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两个自变量,二者均为三分类变量(1表示初中及以下、2表示高中阶段、3表示大专及以上)。(2)经济资本用“家庭年收入”来衡量。调查问卷询问了家长“您家庭过去一年的总收入是多少”,选项为“5万元以下、5万-10万元、10万-20万元、20万元以上”,本研究对这四个选项进行取中值处理,当作连续变量。(3)社会资本用“社会地位感知”来间接测量。因为一般来讲,社会资本较高的家庭,对家庭所处社会地位的自我感知也较高。调查问卷中用题项“您觉得自己家在本地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询问了家长的社会地位感知,选项用1至5分别表示从“很低”到“很高”。

3. 控制变量。在探讨家庭资本与校外培训的关系时,为排除其它混杂因素的影响,基于理论文献和相关研究结论,我们控制了有可能影响校外培训的学校层面、家庭层面和学生个体层面的因素。(1)学校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学校所在地、学校质量。学校所在地为二分类变量(0表示农村乡镇、1表示城市)。学校质量为四分类变量(1表示普通学校、2表示县级示范学校、3表示市级示范学校、4表示省级示范学校)。(2)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兄弟姐妹数、父母教育期望和家長教育焦虑。兄弟姐妹数是由家长填写的孩子的同胞数量,为连续变量。父母教育期望是通过询问家长“您期望孩子最高能达到什么样的学历水平”来测量,为四分类变量(1表示高中及以下、2表示大学专科或本科、3表示硕士研究生、4表示博士研究生)。家长教育焦虑采用自编的“家长教育焦虑量表”,该量表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焦虑分为六个维度:学习成绩焦虑、身体状况焦虑、安全状况焦虑、心理状况焦虑、未来前途焦虑、师资状况焦虑。共12个题项,用李克特5点计分,题项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该量表的信度良好(克隆巴赫系数为0.875),并且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3)学生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就读阶段、学业表现。就读阶段为三分

类变量(1表示小学、2表示初中、3表示高中)。学业表现通过询问家长“孩子的学习成绩总体而言在班上居于什么位置?”来测量,选项用1至5分别表示“下游、中下游、中等、中上游、上游”,分析时作为连续变量。表1显示了三个因变量、核心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和样本分布情况。

表1 因变量及自变量的样本描述

概念	变量名	变量类型	样本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校外培训	培训支出	连续变量	6703	3	0	0.52	0.49
	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	连续变量	6703	12	0	1.86	2.13
	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	连续变量	6703	6	0	0.68	1.16
文化资本	父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3186	3	1	1.71	0.76
		高中阶段	2242				
		大专及以上	1275				
	母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3695	3	1	1.60	0.74
		高中阶段	1997				
		大专及以上	1011				
经济资本	家庭年收入	连续变量	6703	20	2.5	7.34	4.84
社会资本	社会地位感知	连续变量	6703	5	1	2.90	0.91
学校特征	学校所在地	乡镇农村	1411	1	0	0.79	0.41
		城市	5292				
	学校质量	普通学校	2635	4	1	2.11	1.04
		县级示范校	1342				
		市级示范校	2095				
		省级示范校	631				
学生特征	就读阶段	小学	2640	3	1	1.78	0.72
		初中	2913				
		高中	1150				
	学业表现	连续变量	6703	5	1	3.29	1.10
家庭特征	兄弟姐妹数	连续变量	6703	3	0	0.84	0.83
	父母教育期望	高中及以下	107	4	1	2.92	0.89
		大专或本科	2614				
		硕士研究生	1691				
		博士研究生	2291				
	家长教育焦虑	连续变量	6703	60	12	36.70	9.45

(二)数据、方法与模型

本研究采用2019年初收集的“中小学家长和學生调查”数据。该调查由湖北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和

学生发展协同研究中心负责实施,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先抽取学校,再抽取班级,最后对抽样班级的全体学生及家长分别进行问卷调查,抽样学校包括全国多个省份的中小学。本研究对回收的7419份家长问卷进行数据清理后得到可用于分析的6703个有效样本。

本研究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Tobit回归分析考查家庭资本与校外培训的关系。因为存在一部分“没有参加过校外培训”的样本,在这部分样本中,学生参与培训班的数量及培训支出都为0。当把培训班数量、培训支出作为因变量时,因变量并非正态分布,有一部分值为0,属于受限因变量,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OLS)估算会出现较大偏误。因此,本研究采用适用于受限因变量的T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析工具使用SPSS 22.0中的Tobit分析模块。针对“培训支出、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三个因变量的Tobit回归分析计量模型如下:

$$y_{ki}^* = \beta_k x_{ki} + \varepsilon_{ki};$$

$$y_{ki} = \begin{cases} y_{ki}^* & (y_{ki}^* > 0) \\ 0 & (y_{ki}^* \leq 0) \end{cases}$$

其中, k 取值1、2、3,分别对应因变量“培训支出、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 y_{ki}^* 为潜在因变量,当潜在因变量大于0时被观察到,取值 y_{ki} ,当潜在因变量小于0时在0处截尾; x_{ki} 是自变量向量, β_k 是回归系数向量, ε_{ki} 是独立且服从正态分布的误差项。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校外培训现状及影响因素的描述分析

本研究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小學生参加校外培训的比例总体占到72.1%,其中参加了学科及竞赛培训班的占65.3%,参加了素质特长培训班的占38.9%。从参加的培训班数量来看,以所有调查对象为基数,过去一年中小學生参加的学科及竞赛培训班平均有1.86个,参加的素质特长培训班平均有0.68个,二者相加平均达到了2.54个,学科及竞赛培训的参与数量是素质特长培训参与数量的3倍左右。如果排除过去一年没有参加过任何校

外培训班的调查对象,在参加过校外培训的中小學生中,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班的平均有2.58个,参加素质特长培训班的平均有0.94个,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二者相加平均达到了3.52个。腾讯与艾瑞咨询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教育培训行业调查报告,他们发现,在中小学阶段家长让孩子参加的课外培训班平均为2.6个^[30]。可见,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参加2至3个校外培训班在当下比较常见。此外,学科及竞赛类培训班的参与比例明显高于素质特长类培训班,说明以提高学习成绩为目的的校外培训仍是主流。薛海平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19487个调查样本的分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1]。尽管从长远看,素质特长培训能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有利于终身发展,但在升学考试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应试思维和关注成绩仍是家长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表2显示了校外培训的两个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结果。从家庭文化资本来看,无论是父亲学历还是母亲学历,在校外培训方面都存在相同的趋势,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孩子参与两类培训班都越多,培训支出也越高;并且这种趋势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从家庭经济资本来看,家庭年收入与校外培训的两个因变量显著正相关;培训支出与家庭年收入的相关系数约为培训班数量的2倍,可见家庭收入与家长在孩子培训上的投入存在更强的相关性,这印证了一种认识,也即中国家长一有钱就投资子女教育。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长的社会地位感知水平与校外培训的两个因变量都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即自我感知到的社会地位越高,越可能让孩子参加更多校外培训。

从控制变量来看,不同的学校所在地、学校质量、就读阶段、父母教育期望,学生在校外培训上的参与和投入状况都存在显著差异。在城市上学的学生,参与各类培训班的数量及其经济支出都显著高于在农村乡镇上学的学生;学校质量较高的学生,参与各类培训班的数量及其经济支出都显著高于学校质量较弱的学生;小学和高中阶段的培训支出要显著高于初中,小学阶段的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显著高于初中和高中阶段;父母对孩子将来获得的最终学历期望越高,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数量和

表2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双变量描述分析

自变量	变量分类	Y ₁ :培训支出	Y ₂ :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	Y ₃ :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	方差分析
父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0.42	1.75	0.60	F ₁ =219.34***
	高中阶段	0.55	1.93	0.72	F ₂ =9.0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74	2.02	0.82	F ₃ =18.48***
母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0.42	1.76	0.60	F ₁ =263.22***
	高中阶段	0.58	1.96	0.75	F ₂ =9.90***
	大专及以上学历	0.79	2.04	0.86	F ₃ =25.12***
家庭年收入	连续变量	0.27***	0.12***	0.12***	---
社会地位感知	连续变量	0.12***	0.14***	0.13***	---
学校所在地	乡镇农村	0.31	1.53	0.59	F ₁ =349.26*** F ₂ =42.84***
	城市	0.58	1.95	0.71	F ₃ =11.76***
学校质量	普通学校	0.45	1.57	0.63	F ₁ =47.59***
	县级示范学校	0.51	2	0.7	F ₂ =28.97***
	市级示范学校	0.58	2.04	0.78	F ₃ =10.51***
	省级示范学校	0.67	2.18	0.53	
就读阶段	小学	0.58	1.89	0.85	F ₁ =57.49***
	初中	0.45	1.8	0.63	F ₂ =2.56
	高中	0.57	1.95	0.43	F ₃ =59.19***
学业表现	连续变量	0.09***	0.03*	0.06***	---
兄弟姐妹数	连续变量	-0.12***	-0.03*	-0.01	---
父母教育期望	高中及以下	0.27	1.52	0.64	F ₁ =50.00***
	大专或本科	0.45	1.67	0.62	F ₂ =14.16***
	硕士研究生	0.6	1.92	0.68	F ₃ =5.70***
	博士研究生	0.56	2.05	0.76	
家长教育焦虑	连续变量	-0.02	0.03*	-0.03*	---

注:F₁、F₂、F₃是方差分析中的F值,分别对应因变量“培训支出、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p<0.05,**p<0.01,***p<0.001。

经济支出也越高。孩子当前的学业表现与参与校外培训的数量及其经济支出显著正相关;家庭兄弟姐妹数与培训支出显著负相关,与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显著负相关;家长焦虑与学科竞赛培训班数量显著正相关,与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显著负相关。

(二)家庭资本对校外培训的影响

表3是校外培训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对Tobit模型的系数解释不同于OLS模型,除了联系潜变量进行解释,系数所代表的影响效应还要结合四类期望值进行考察^[32]。但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不是变量的影响效应大小,而是其影响方向及统计显著性。从表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

表3 校外培训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

	Y ₁ :培训支出		Y ₂ :学科及竞赛培训班数量		Y ₃ :素质特长培训班数量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截距	-0.373*** (0.082)	-4.524	-2.37*** (0.412)	-5.754	-2.161*** (0.362)	-5.963
父亲学历(参照:初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0.097*** (0.027)	3.637	-0.026 (0.135)	-0.192	0.275* (0.118)	2.339
高中阶段	0.032 (0.019)	1.669	-0.006 (0.096)	-0.058	0.135 (0.085)	1.587
母亲学历(参照:初中及以下)						
大专及以上	0.184*** (0.028)	6.512	-0.018 (0.142)	-0.129	0.379** (0.124)	3.067
高中阶段	0.069*** (0.02)	3.534	0.062 (0.098)	0.636	0.236** (0.087)	2.724
家庭年收入	0.022*** (0.002)	13.127	0.058*** (0.009)	6.726	0.039*** (0.007)	5.259
社会地位感知	0.029*** (0.009)	3.235	0.365*** (0.044)	8.236	0.26*** (0.039)	6.606
学校所在地	0.231*** (0.023)	10.045	0.409*** (0.116)	3.537	0.149 (0.103)	1.457
学校质量(参照:普通学校)						
县级示范学校	-0.007 (0.023)	-0.289	0.567*** (0.113)	5.001	0.259** (0.099)	2.609
市级示范学校	0.022 (0.02)	1.068	0.545*** (0.102)	5.347	0.234** (0.089)	2.644
省级示范学校	0.101** (0.034)	2.969	0.841*** (0.17)	4.957	-0.016 (0.157)	-0.100
就读阶段(参照:小学)						
初中	-0.084*** (0.017)	-4.897	-0.051 (0.086)	-0.591	-0.53*** (0.075)	-7.026
高中	-0.139*** (0.026)	-5.391	-0.305* (0.129)	-2.365	-1.41*** (0.121)	-11.661
学业表现	0.011 (0.008)	1.420	-0.007 (0.038)	-0.184	0.092** (0.034)	2.728
兄弟姐妹数	-0.047*** (0.01)	-4.913	-0.123** (0.048)	-2.569	0.018 (0.042)	0.420
父母教育期望(参照:高中及以下)						
大专或本科	0.183** (0.066)	2.758	0.559 (0.329)	1.698	-0.02 (0.288)	-0.069
硕士研究生	0.242*** (0.068)	3.571	0.761* (0.338)	2.251	0.005 (0.295)	0.015
博士研究生	0.215*** (0.067)	3.190	0.877** (0.336)	2.613	0.037 (0.293)	0.128
家长教育焦虑	0.003*** (0.001)	4.108	0.023*** (0.004)	5.475	0.003 (0.004)	0.921
Log(scale)	-0.528*** (0.011)	-48.740	1.069*** (0.012)	92.730	0.841*** (0.016)	53.251
Log likelihood	-5964.232		-12784.94		-8140.441	
Wald statistic	1106.127		363.355		445.944	
D.f.	18		18		18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水平,父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的家庭,通常会让孩子参加更多的素质特长培训,对孩子的培训支出也更高。这种情况在母亲学历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来说,相对于“初中及以下”学历水平,母亲学历为“大专及以上”和“高中阶段”的家庭,孩子参加素质特长培训都更多,培训支出也都更高。父亲学历和母亲学历对孩子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的影响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回归系数的符号看出一种倾向,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学历在“大专及以上”的,相对于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父母,让孩子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更少。此外,家庭年收入越高,孩子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素质特长培训都越多,培训支出也越高。家长感知到的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孩子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素质特长培训都越多,培训支出也越高。

四、研究结论、讨论及政策反思

(一)研究结论:家庭资本显著影响校外培训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子假设 1b,其它研究假设都得到实证证据支持。总体而言,家庭资本对学生参与校外培训(包括学术类和非学术类)的数量及其经济支出均存在着显著正向影响。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越是有钱、有文化、有地位的父母,越重视子女在学校之外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获得。

具体来看,第一,家庭文化资本方面,学历水平较高的父母,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父母,相对而言更重视孩子综合素养的培养,让孩子参加更多的素质特长培训班,对孩子的校外培训经济投入也相对更高。但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参与学科及竞赛培训数量的正向影响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子假设 1b 没有得到统计支持)。第二,家庭经济资本方面,家庭年收入越高,孩子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班、素质特长培训班都越多,校外培训支出也越高。第三,家庭社会资本方面,家庭社会地位越高,孩子参加学科及竞赛培训、素质特长培训都越多,校外培训支出也越高。

(二)家庭资本影响校外培训的理论及现实意蕴

“家庭资本对校外培训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意味着什么?一方面,如果把校外培训视为一种教育资源(这一点事实上已毋庸置疑),那么能否公平获得这类教育资源就意味着“教育机会是否平等”。一些关于“校外培训能提高学生成绩”的实证研究结论强化了这种教育机会对社会地位获得和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性。仅仅因为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不同,学生获得校外培训资源的机会就显著不同,这种不是由后天自身努力决定,而是由先天家庭禀赋决定的教育机会获得,有违普遍主义原则^[33],是一种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无论教育供给如何,家庭资本都会驱使家长追逐差异化的教育机会(即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以提高子女竞争优势,从而间接维持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这方面的另一个明证是,越来越多的校外培训不再是为了“补差”,而是为了“培优”^[34]。本研究的结论一定程度上支持了MMI理论和EMI理论关于“维持不平等”的理论假设。

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常常彼此重叠,影响和改变着孩子的发展。有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在预测儿童参加有组织的课外活动方面依然强大。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和父母具有高收入的孩子对有组织的活动的参与,远远高于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和父母收入较低的同龄人^[35]。中产以上阶级往往同时具有较高收入和较高受教育程度,父母有能力帮助孩子获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通过教育干预来改变孩子的生活。这些干预单独来看微不足道,但累计起来就显得至关重要。家长在子女校外培训上的不断投入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但父母能给予孩子的资源、天赋和机会却不尽相同。孩子一生的关键环节往往受制于家庭和父母的长远影响,最终他们很可能陷入与父母相似的处境。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是没可能,但并不常见^[36]。从这角度讲,并非所有的孩子都拥有平等的机会。

(三)家庭文化资本、素质教育与新型不平等

家庭文化资本与素质特长培训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校外素质特长培训可以看作是一种素质教育,是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领域。本研究呈现出

了这方面的一些差别:文化资本对学生参与素质特长培训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学生参与学科及竞赛培训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学历水平较高的父母,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重视孩子综合素养的培养,而不是一味让孩子“死读书、读死书”。

素质教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是长远的,直到大学和整个人生。体现素质教育的是“视野”,也即知识所转化的见识、趣味、辨别力和判断力,长期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认知图式、审美趣味和性情倾向。一项针对中国精英大学学生发展的质性研究显示,视野的差距比纯教育质量的差距更令人绝望,这不是学生自己造成的,而是其家庭出身造成的。“大学四年,无论怎么苦学都难以弥补的差距,这是人家长期熏陶和积累的资本。文化资本如同一扇玻璃天窗,看似没有障碍,透明敞亮,只有用心去撞击,在失败的疼痛中才能体会”^[37]。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莫斯·可汗(Shamus R. Khan)在他那本获得2011年米尔斯奖的名著《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中揭示了精英学校里学生们的优秀素质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强调艰苦奋斗和天生我才的重要性,强调用经历(你做过些什么)和能力而不是家境来赢得地位,在貌似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中训练淡定、品位和脾性。特权不再被看作是机会不均所造成的,而是来自于天赋、能力和努力,学生们所拥有的社会、文化优势通过一种“平等”的方式被保护和维持下去,同时也掩盖了持久的不平等的存在^[38]。传统意义上的入学机会不平等也许会得以缩小甚至消除,而更加隐秘的“综合素质养成、个人全面发展”的不平等将持续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资本将继续成为优势家庭和精英们制造差异的工具。

(四)对校外培训监管政策的反思

从发展态势看,校外培训还会继续扩张并更加多样化,对校外培训的态度存在着“效率”和“公平”两种取向。前者认为校外培训有利,因为它能增加教育的多样性并提升公众的人力资本;后者认为校外培训有害,因为它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和社会不平等,增加学生负担,浪费社会资源。从全球范围来看,政府对校外培训的管理政策也存在四种类型:禁止(如韩国、新加坡)、忽视(很多国家如此)、承认并

规范(如日本、中国)、鼓励(如美国、英国)^{[39][40]}。但由于客观存在的复杂社会利益冲突、生存方式选择以及文化价值冲突,各国教育政策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41]。

就中国而言,国务院曾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着力整顿以“应试”为导向的校外培训,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营造良好教育生态^[42];有学者建议完善教育培训机构准入及退出机制,监控其教育服务质量,建立规范有序的外部治理体系^[43]。但这些政策及主张重在规范而不是解决教育需求问题。我国也曾有学者提出政府应该对家庭资本较弱且孩子成绩落后的家庭提供补贴,帮助他们借助校外培训缩小与其他同学的成绩差距^[44];或者对那些能从校外培训中获益更多的弱势群体(如较少有机会参加校外培训的学生)提供校外培训机会^[45]。但这些做法依然有治标不治本之嫌。MMI理论和EMI理论认为只有学生和家长相当数量和质量的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时,有能力的家庭才会放弃对各种校内外教育机会的追逐,因父母追逐“更多、更好的教育”而形成的竞争以及因家庭资本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得以缓解。

缩小学校教育质量差距是否可以缓解家庭在校外培训上的竞争?日本、韩国、新加坡拥有充足高质量的教育供给体系,校外培训仍广泛存在,而刚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教育体系薄弱,校外培训却较少^[46]。可见影响校外培训规模的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质量,更重要的是社会竞争程度,社会竞争程度以及对竞争优势的渴望是推动家长竭力“维持不平等”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王善迈.教育公平的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93-97.
- [2]马克·贝磊,廖青.“影子教育”之全球扩张:教育公平、质量、发展中的利弊谈[J].比较教育研究,2012,(2):13-17.
- [3]薛海平.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J].教育与经济,2016,(2):32-43.
- [4][34][46]马克·贝磊,奥拉·郭,刘淑杰.免费教育的表象背后:影子教育及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J].教育科学研究,2017,(2):42-48.
- [5][6]薛海平.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3):47-69+188-189.

- [7]Coleman, James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1): S95-S120.
- [8]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3): 86-98+207.
- [9]赵延东, 洪岩璧. 社会资本与教育获得——网络资源与社会闭合的视角[J]. *社会学研究*, 2012, (5): 47-69+243-244.
- [10]朱伟珏. “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 *社会科学*, 2005, (6): 117-123.
- [11]李全生.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J].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2003, (1): 8-12.
- [12]Bourdieu, Pierre, J. C. Passeron.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13]周红云. 社会资本: 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4): 46-53.
- [14]张玉琳. 经典社会分层理论的哲学解读及时代价值[J]. *科学经济社会*, 2013, (4): 20-24.
- [15]Sewell W H, Hauser R M, Springer K W, et al. *As We Age: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1957-2001*[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04, 20(4): 3-111.
- [16]孙远太. 家庭背景、文化资本与教育获得——上海城镇居民调查[J]. *青年研究*, 2010, (2): 35-43+95.
- [17]Tansel A, Bircan Bodur 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n Turkey Recent Evidence on its Various Aspect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07, 9(1): 162-171.
- [18]楚红丽. 我国中小学生课外补习家庭之背景特征及个人因素[J]. *教育学术月刊*, 2009, (12): 22-27.
- [19]曾满超, 丁小浩, 沈华. 初中生课外补习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甘肃、湖南和江苏3省的初中生课外补习调查[J]. *教育与经济*, 2010, (2): 7-11.
- [20]洪岩璧, 赵延东. 从资本到惯习: 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J]. *社会学研究*, 2014, (4): 73-93+243.
- [21]杨传昌, 侯立元. 教育与当今中国社会阶层流动[J]. *教育学术月刊*, 2009, (2): 11-13.
- [22]徐水晶, 周东洋. 教育作为阶层代际传递的中介作用研究[J]. *社会科学*, 2017, (9): 91-100.
- [23](美)安妮特·拉鲁. 家庭优势: 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M]. 吴重涵等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 [24]Bruce Fuller, Susan D. Holloway, Marylee Rambaud and Costanza Eggers-Piérola. How Do Mothers Choose Child Care? Alternative Cultural Models in Poor Neighborhoods[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6, 69(2): 83.
- [25]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 66(1): 41-62.
- [26]Shavit, Yossi & Hans-Peter, Blossfeld.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1994, 42(4): 408.
- [27]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J]. *社会学研究*, 2010, (3): 86-117+248.
- [28]Samuel R Lucas.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6), 1642-1690.
- [29]马克·贝磊, 玛格达·努慈莎·科巴希泽, 李佳丽等. 影子教育研究中的测量问题: TIMSS 和 PISA 面临的挑战和困难[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 (Z2): 9-18+23.
- [30]腾讯数据实验室&艾瑞咨询: 2017年中国教育培训行业白皮书[EB/OL]. <http://www.3mbang.com/p-220982.html>. 2019-03-29.
- [31]薛海平. 课外补习、学习成绩与社会再生产[J]. *教育与经济*, 2016, (2): 32-43.
- [32](美)保罗·埃里森等著, 吴晓刚主编. 高级回归分析[M]. 李丁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11.
- [33]张守夫. 西方普遍主义的历史渊源[J]. *哲学研究*, 2010, (9): 83-87.
- [35][36](美)安妮特·拉鲁. 不平等的童年: 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第2版)[M]. 宋爽, 张旭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 [37]刘云杉. 自由选择与制度选拔: 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的精英培养——基于北京大学的个案研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7, (4): 38-74+186.
- [38](美)西莫斯·可汗. 特权: 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M]. 蔡寒疆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39]Hai-Anh Dang F., Halsey Rogers. How to interpret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private tutoring: Human Capital Deepening, Inequality Increasing, or Waste of Resources?[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530.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8.
- [40]秦乐琦, 覃嫫, 池梦丹等. 影子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探析[J]. *教育学术月刊*, 2019, (5): 70-77+95.
- [41]楼世洲. “影子教育”治理的困境与教育政策的选择[J]. *教育发展研究*, 2013, (18): 76-79.
- [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jzhengce/content/2018-08/22/content_5315668.htm. 2020-6-9.
- [43]胡天佑. 我国教育培训机构规范与治理[J]. *教育学术月刊*, 2013, (7): 14-19.
- [44]薛海平. 家庭资本与教育获得: 基于影子教育中介效应分析[J]. *教育与经济*, 2018, (4): 69-78.
- [45]李佳丽. 谁从影子教育中获益——基于选择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J]. *教育发展研究*, 2016, (20): 66-73+80.

责任编辑: 肖第郁